

『汉水文化』省级重点学科资助出版

主编 雷勇

sanguo wenhuayanjiu

三国文化研究

(第一辑)



西北大学出版社

三四文化研究

第三卷 第三号

1997年 10月

第 10 期

第 10 卷

第 10 期

第 10 期

“汉水文化”省级重点学科资助出版

三国文化研究

(第一辑)

主 编 雷 勇



西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国文化研究. 第一辑 / 雷勇主编. —西安: 西北
大学出版社, 2017. 6

ISBN 978-7-5604-4066-8

I. ①三… II. ①雷… III. ①文化史—研究—中
国—三国时代 IV. ①K236.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52354 号

三国文化研究(第一辑)

作 者: 雷 勇 主 编

出版发行: 西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地 址: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

邮 编: 710069

电 话: 029-88303042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西安华新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960 毫米 1 / 16

印 张: 34

字 数: 584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04-4066-8

定 价: 88.00 元

《三国文化研究》(第一辑)

编委会

主 编：雷 勇

编委会主任：刘保民 雷 勇

编委会委员：刘保民 雷 勇 张西虎 梁中效

李宜蓬 蒋 丽 马元元 刘 莉

主 编 单 位：陕西理工大学三国文化研究所

前言

在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中,三国文化是最有活力、最具雅俗共赏特色的“亚文化”之一;而在丰富多彩的汉中传统文化中,三国文化又是最具特色、影响最为深广的组成部分。

汉中北临秦岭、南界巴山,地当南北交接地带,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在三国时期,汉中之得失关系到秦陇、巴蜀之安危,战略地位尤显重要,因而引起了当时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、军事家的普遍重视。诸葛亮在《隆中对》中就向刘备提出了“跨有荆、益”,两路出兵,夺取中原的方略,对汉中的形势也做了详尽的分析。鲁肃、周瑜、曹操等也都看出了汉中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。因此,在赤壁之战后,汉中就成了曹、孙、刘三家共同关注的焦点,更成了蜀、魏两国争夺的中心。

赤壁之战前,张鲁凭借汉中财富土沃、四塞险固的有利条件,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,雄踞巴、汉近三十年。由于群雄逐鹿中原,暂时无力西顾,张鲁统治下的汉中相对安宁,人口大量增加,经济也有较大的发展,一时出现了“民殷国富”的繁荣景象。

赤壁之战后,曹、孙、刘三家的军事力量有了一定变化,因此在战略上也都做了重新部署,夺取汉中,进而统一全国则成了曹、刘两大集团的共同目标。公元215年,曹操亲率十万大军征讨张鲁,开始了对汉中的争夺。曹军攻破了张卫据守的阳平关,迫使张鲁撤离汉中,最终降曹。216年春,曹操命大将夏侯渊等镇守汉中,自己则率主力返回中原。

对刘备集团来说,汉中是益州之咽喉,“若无汉中,则无蜀矣”,能否夺取汉中是否能立足巴蜀的头等大事,这是刘备集团君臣的共识。217年,刘备刚刚稳定了益州局势就迫不及待地发起了争夺汉中的战役。219年春,黄忠在定军山刀劈夏侯渊,取得了争夺汉中战役的关键性胜利,曹操被迫亲率大军增援,又被骁将赵云大败于汉水之滨,曹操攻守无策,只好放弃汉中。此年,刘备自立为汉中王。

刘备在汉中称王后即在汉中设立了蜀汉政权的行政机构,任命魏延为都督,兼汉中太守。此后,蜀汉一直十分重视汉中的防务,多次委派重臣镇守汉中。227年春,丞相诸葛亮亲自出屯汉中,并以汉中为基地,开始了长达8年的北伐,最终遗命葬汉中定军山。继任者蒋琬、费祎等也先后出镇汉中。蜀汉40多年苦心经营汉中,从而确保了蜀汉政权的稳固。

263年,魏将钟会、邓艾率兵伐蜀,汉中失守,蜀汉也在一个多月后灭亡。

在三国纷争的岁月里,各路英雄在汉中这个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,也在汉中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。今天,汉中仍遗存有众多的三国胜迹,包括武侯墓、武侯祠、马超墓、马超庙、刘备称汉中王设坛处、诸葛亮制木牛流马处、诸葛亮读书台、古虎头桥等等,其中勉县武侯墓是全国唯一的武侯墓,勉县武侯祠则是全国最早的武侯祠,更是汉中最负盛名的文化遗迹,成为来汉中者必定游览的圣地。可以说三国文化是汉中地域文化中最重要精神财富之一。

汉中是三国文化名城,坐落在这座文化名城的陕西理工大学也一直把《三国演义》和三国文化研究作为学术研究的重点,长期以来,形成了一支稳定的研究队伍,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。学校学报的“三国文化研究”专栏在学术界有较高的知名度。《汉中师范学院学报》1997年第1期“三国文化专号”也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。1997年,我校和中国《三国演义》学会成功举办了“中国第十一届《三国演义》学术研讨会”,近百名学者云集汉中,共同交流,成就了一段学术佳话。为了进一步凝聚研究力量,加强学术交流,建设特色优势学科,学校于2015年5月成立了三国文化研究所,同年10月,三国文化研究所和汉水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“2015·汉中《三国演义》与三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”,来自国内外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,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,我校的三国文化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绚丽多彩的三国文化是汉中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、也最为重要的一部分,在汉中“三市”建设中,三国文化也已成为一张十分亮丽的名片。我相信,有一批专家学者的辛勤努力,有国内外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,我校的三国文化研究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,同时也会为汉中的文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刘保民

目 录

作者及版本研究

施罗定位,不可移易	欧阳健/ 3
周邨先生所藏《三国演义》两种叙考兼及李渔序两种 ——为纪念中国《三国演义》研究会顾问周邨先生而作	萧相恺/ 10
在建阳刻书文化背景上讨论“三国”小说之三题	涂秀虹/ 21
尹直《名相赞》与《三国演义》研究述评	宋克夫/ 40
两种《三国演义》版本中的“七擒孟获”及其文化意蕴探析	孟子勋 闫 博/ 48
周文业先生和他的《三国演义》版本数字化研究	马 达 张弦生/ 56
十五年来《三国演义》作者、成书与版本研究述要	何红梅/ 61

思想意蕴与文化内涵研究

《三国演义》与政治智慧	沈伯俊/ 79
从《三国演义》窥探小说中的民本、自由法律理念	[新加坡]辜美高/ 89
从《三国演义》看联盟抗敌的政治思想	段庸生 刘 越 李小红/ 99
天理与天数的矛盾及解决办法——《三国演义》与《封神演义》之比较	陈国学/ 110
魏、蜀、吴三国招贤纳才用例浅析	蔡静波/ 118
明清文化视域下的《三国演义》序跋透视	温庆新/ 127

以“天道”的名义重读《三国》	杨建文/ 140
谈《三国演义》战争中的计谋	姚让利/ 146
陆逊在猇亭之战中的智谋略论	宫桂春/ 155
从刘备之泪看其权术谋略	吕政轩 杜娟/ 159
正确评价《三国志演义》里的谋略	齐裕焜/ 175
论《史记》对《三国演义》的影响	陆进/ 182
《三国演义》谶言研究	戴承元 叶根虎/ 196
《三国演义》中的管辂与轨革卦影术	罗陈霞/ 216
《三国演义》是三国历史的精彩回放	王明世/ 240
“衣带诏”系子虚乌有的矫诏	张淑蓉/ 254

人物形象研究

《三国演义》中士人描写简论	李丽平/ 261
《三国演义》叙“士”刍议	伍大福 严明/ 270
孔融的前生今世	石玲/ 282
曹操的历史形象及《三国演义》对其的塑造	孙启祥/ 294
汉末三国文化与诸葛亮之侠风	董国炎/ 311
诸葛亮:史传与文学的差异及其原因	夏旻/ 320

三顾茅庐管见	王 猛/ 325
“三顾茅庐”与志怪小说	[日]伊藤晋太郎/ 334
论孟达真实面目及其叛蜀之原因	杨明贵 戴承元/ 342

创作方法与艺术研究

近三十年来关于《三国演义》虚实叙事的研究	郑铁生/ 365
近三十年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比较研究述略	许勇强 李蕊芹/ 375
性格决定命运——三国人物的悲剧性格与悲剧命运	鲁德才/ 386
《三国演义》战争书写及其范型意义	雷 勇 崔春雨/ 400
《三国演义》中的“的卢”故事及其叙事功能	蔡美云/ 411
《三国演义》中的琴	过承祁/ 419

传播与影响研究

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的文学影响三题	石 麟/ 427
汉水流域戏曲中的三国戏	王建科/ 437
论汉中三国戏对《三国演义》的改编	邵金金 白丽艳/ 447
论陆士谔《新三国》中的新民想象	王士春/ 457
从“忠实原著”到“解构原著”——《三国演义》电视剧改编观念的探讨	张 蓉 刘淑贞/ 465

汤姆斯与《三国演义》的首次英译 王 燕/ 472

日本吉川英治“三国”小说中的首尾问题 桦 桢/ 485

《三国演义》在韩传播的若干问题 孙勇进/ 494

论《三国演义》与泰国文学融通的榕树模式 梁冬丽/ 503

新媒介语境下三国文化去经典传播..... 黎 黎/ 512

2015·汉中《三国演义》与三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雷 勇 蒋 丽/ 523

后记 / 532



作者及版本研究



施罗定位,不可移易

欧阳健

一部中国小说史,犹如绵绵不绝的长河,环环相扣的链条,欲勾勒延续之轨迹,紧要的是为作家准确定位,以发现他提供的前人没有的新的东西,寻求他对于后世创作的影响,从而确立他在小说史上的地位。本文所谓“施罗定位”,包含两个层次:一是施耐庵与罗贯中属于哪一时代,二是施耐庵与罗贯中之间的关系。

先说第一个层次。

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的成书,向以元末明初说为主导,20世纪80年代以来,陆续出现了若干新说,力主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是明后期之作,其“文献依据”是:现存最早的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的版本,都出在嘉靖以后。按照这种“版本根据”,假如所有明版《三国志演义》全部湮没,只留下最流行的毛评《第一奇书》,以此断定《三国演义》是清人作品,能用什么来反驳呢?

又有以若干内证,如士兵、白银、腰刀、子母炮等细节为据者。后人掌握的“历史知识”,有时是不太靠得住的。某些历史上存在的事物,可以说“有”,却不可轻易说“没有”;可以说“很少”,却不可轻易说“唯一”;可以说“较早”,却不可轻易说“最早”。诸多新说之未为人所接受,道理就在这里。

较为稳妥的做法,是据传世文献来判定年代。时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,凡人皆具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之观念,这种“时间感”决不会误差到离奇的程度。田汝成的《西湖游览志馀》,称“钱塘罗贯中本者,南宋时人,编撰小说数十种”;起北赤心子的《绣谷春容》,称“钱塘罗贯,南宋时人,编撰《水浒传》”。田汝成是嘉靖五年(1526)进士,史称博学,谙晓前朝遗事。设若《三国志演义》真的首次出现在嘉靖,田汝成读到的就是一本新书,罗贯中差不多就是他的同时代人,他怎会糊涂到以为是二百多年前的南宋人呢?杨美生刊本《三国英雄志传》、刘荣吾刊本《三国志传》均题“元东原罗贯中演义”,熊飞馆《英雄谱》本题“元东原罗贯中编次”,三馀堂本《三国英雄志传》题“元东原罗贵志演义”,皆指罗贯中为元人,都绝无明后期作品



的观念。

汪道昆万历十七年(1589)作《〈水浒传〉序》，中说：“故老传闻：洪武初，越人罗氏，诙诡多智，为此书共一百回，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，以为之艳。”三年后，李贽作《〈忠义水浒传〉序》，中说：“《水浒传》者，发愤之作也。施罗二公身在元，心在宋，虽生元日，实愤宋事。”汪道昆生于嘉靖四年(1525)，六十四岁时为《水浒传》作序，尚称系据“故老传闻”，知作《水浒传》的罗氏是洪武初(1368)人；李贽生于嘉靖六年(1527)，六十五岁时为《水浒传》作序，亦称“施罗二公身在元”。洪武元年(1368)至汪道昆作序日，已过去了二百二十一年。从他和李贽的时间感受看，都是对遥远往事的追述，丝毫没有《水浒传》是当代人所作新书的感觉。假如《水浒传》的成书不早于嘉靖十二年(1533)，其时汪道昆已经八岁，万历十七年(1589)作序，将五十六年前问世的《水浒传》，称作“洪武初”的作品，是完全不可思议的。凭《水浒传》刊本的两篇序，就能证明施罗二公的年代，是在元末或者明初。

施耐庵有一件关键性史料，即《兴化县续志》载录的《施耐庵墓志》，其中说：“公讳子安，字耐庵。生于元贞丙申岁(1296)，为至顺辛未(1331)进士。曾官钱塘二载，以不合当道权贵，弃官归里，闭门著述，追溯旧闻，郁郁不得志，赍恨以终。”与《水浒传》成于洪武初的说法吻合。有人以其发表较晚，且有伪造嫌疑，不予承认。殊不知《兴化县续志》1918年为方志大家李详(李审言)倡续。光绪三十二年(1906)，两江总督端方创办江楚编译官书局，聘李详为帮总督纂；宣统元年(1909)，张人骏任两江总督，改江楚编译官书局为江苏通志局，聘李详为分纂；1913年，江苏通志局恢复，冯煦任总纂，聘李详为协纂，参与修订《江苏通志》，因撰《〈江苏通志·艺文志〉商例》，学者赅之。李详曾任江都、甘泉、仪征三县志“人物”“儒林”“文苑”各传及《艺文志》《舆地沿革表》审阅、定稿，主持纂修了《阜宁县志》《盐城县志》。1923年，任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；1928年，中央研究院聘其和陈垣、鲁迅、胡适等12人为特约著述员。1919年，曾任兴化知县的赵兴霖再任兴化县知事，聘李详为总纂，续修《兴化县志》。李详命刘仲书到白驹采访，至施家桥借得《施氏家谱》，见内载王道生《施耐庵墓志》，汇报李详审订后以为：“施耐庵先生因为著《水浒传》而坐过大牢，也因为著《水浒传》享了大名，可惜他的生平事迹，不独胡欧、张梁四种县志未采入载明，就是他的子孙谈到他的真相，也是‘讳莫如深’。现在民国成立，文字既不为科举所束缚，人物又不为专制政体所限制，县志有所记载，从



此更没有什么顾忌,那末,大文学家的施耐庵,我们可以从宽采访他的古迹和遗闻,一一载入‘补遗’栏中。”(刘仲书《施耐庵历史的研究》)据1952年10月文化部调查组《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》:“我们在兴化王益谦(续修兴化县志委员会职员,任书记员)先生手,得到续修《兴化县志》时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原稿两份。”经鉴定:“原稿《施耐庵墓志》和《兴化县续志》上所载的原文是毫无出入的。”(《明清小说研究》第4辑)要之,《施耐庵墓志》的真实性是肯定的,可以放心用作文献。

再说第二个层次。

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,向来以“施罗二公”并称,施耐庵居前,罗贯中居后。嘉靖本《忠义水浒传》、袁无涯本《忠义水浒全传》,卷端均题“施耐庵集撰,罗贯中纂修”,据此可判定施耐庵和罗贯中《水浒传》作者的身份,揭示施耐庵的工作是“集撰”,罗贯中的工作是“纂修”。“撰”有“聚集”“编集”的意思,又有“著作”“著述”的意思。鲁迅曾说过“《水浒传》是集合许多口传或小本‘水浒’故事而成”的话,“集撰”和“纂修”二语,极为得宜地概括了施、罗对《水浒传》成书的贡献,和高儒《百川书志》所录之《水浒传》一百卷,题“施耐庵的本,罗贯中编次”,完全一致。现存明刊《三国志演义》嘉靖壬午(1522)刊本、周曰校刊本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等,卷端均题“晋平阳侯陈寿史传,后学罗本贯中编次”,闽书林杨美生刊本《三国英雄志传》,卷端题“晋平阳侯陈寿志传,元东原罗贯中演义”。陈寿是晋代杰出史家,《三国志》早被誉为古代良史之一。罗贯中将《三国志》“编次”“演义”为长篇小说,他的《三国志演义》作者的身份,在题署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。

从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题“晋平阳侯陈寿史传,后学罗本贯中编次”的规格(陈寿非“平阳侯”而是平阳侯相,此题署突出揄扬之心),以观《水浒传》“施耐庵集撰,罗贯中纂修”的题署,足以表明罗贯中对施耐庵的尊重和推崇。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云:“元人武林施某所编《水浒传》特为盛行……其门人罗本亦效为《三国志演义》。”确指罗是施的“门人”。王道生《施耐庵墓志》也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,且谓施耐庵比罗贯中大十九岁,他在钱塘为官(或辞官后在杭州逗留)期间,罗贯中已届成年,亦正活动于浙江钱塘、慈溪一带,闻施耐庵之名而执弟子礼,实在情理之中。

《录鬼簿续编》说罗贯中“与人寡合”,且“遭时多故”,内含丰富的潜台词。王



圻《稗史汇编》说他是“有志图王者”，顾苓《塔影园集》说他曾“客霸府张士诚”，徐渭仁《徐纳所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》甚至说他“客伪吴，欲讽士诚，继成一百二十回（《水浒传》）”。施耐庵与张士诚也有密切关系，耐庵遗曲《秋江送别——即赠鲁渊（道原）刘亮（明甫）》，提供了不少世人不知的信息。据史载，张士诚据吴之后，“东南之士，咸为之用”，杨维禎、俞思齐、陈基、王逢、高启、鲁渊等都抱有真诚的幻想，后张氏集团日渐骄奢，诸人又逐渐感到失望。这种矛盾的心态，在《秋江送别》中有真切的流露：“记当年邂逅相逢，玉树兼葭，金菊芙蓉，应也声同。”鲁渊、刘亮与施耐庵邂逅相逢，彼此间心绪甚佳，当是初入张幕之时。然而曾几何时，施耐庵却发出了“五年随断梗，千里逐飘蓬”的哀叹。“千里”为概指，兴化至苏州约近千里；“五年”则是实指，经刘冬先生考证，至正二十三年（1363）九月，鲁渊因谏阻张士诚称吴王，辞去博士之职，离开苏州返回故乡，故有“秋江送别”之举。从至正二十三年倒数上去，则他之入张士诚幕，应在至正十八年（1358）：这就“第一次获得了施耐庵于何时何地作何事——这样一个具体的支撑点”。顾逊《赠施耐庵》诗中，有“君自江南来问津，相逢一笑旧同寅”之句。顾逊是兴化人，对刚从苏南回到兴化的施耐庵说“自江南来”，自无疑义；而顾逊为至正间进士，至正十九年至二十二年（1359—1362）任松江同知，后迁嘉兴路同知，都在张士诚治下（虽然名义上是在元王朝体系下为官），恰可称施耐庵为“同寅”。鲁渊洪武九年（1376）在《岐山鲁氏宗谱自序》中，追述自己参与张士诚集团的历史，就有不少涂饰之词，如：“任江浙儒学副提举，丞相命也。”“张士诚据吴，以礼来聘，除国子博士，闻之惊悸，是狂病疾，或披发行歌于市，冬十月患怔怖，复患羸疾，遂解。”鲁渊为什么要在历史问题上含混掩饰？原因就在心理上的顾忌。王道生《施耐庵墓志》云：“及长，得识门人罗贯中于闽。同寓逆旅，夜间炮烛畅谈先生轶事，有可歌可泣者，不禁相与慨然。……去岁，其后述元（文昱之字）迁其施耐庵祖墓葬于大营焉，距白驹镇可十八里，因之余得与流连四日。问其家世，讳不肯道；问其志，则又唏嘘叹惋；问其祖，与罗贯中所述略同。”情绪与鲁渊是何其相似！曲中有“便此后，隔钱塘南北高峰”之句，可知施耐庵于1363年前后，在苏州、钱塘都留下过足迹；而罗贯中1364年在杭州，1366年在慈溪，他们的相遇在时间地点上都毫无问题。

王道生《施耐庵墓志》还有一点殊可注意，即“遇罗贯中于闽”。罗贯中来福建做什么？——谋求出版《水浒传》。建阳是中国刻书业三大中心之一。《京本忠义